



俞天白 知名作家。浙江义乌人。曾任《萌芽》杂志副主编、《沪港经济》杂志总编辑。著有“大上海人”系列等长、中篇小说30余部。一部《大上海沉没》被誉为“80年代的《子夜》”，引起一时震撼。作品曾多次获各类文学奖。对儿子俞可潜心教育，自诩最好的作品是——“我的儿子”。

俞天白

俞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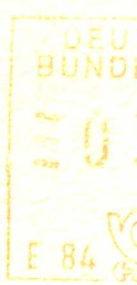
上海遠東出版社

留德家書

一个本土作家和他留德博士儿子的人生对话



俞可 俞天白之子。1970年生于上海。1988年入上海师范大学。1991年赴德国留学。2005年获德国约汉内斯·古登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6月回国入华东师范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留德14年，不仅成就了他的学业，也成就了他“成年人的成长”。





一个本土作家和他留德博士儿子的人生对话

留德家书

俞天白

俞可

上海远东出版社

Forschungs-
gemeinschaft
Market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德家书:一个本土作家和他留德博士儿子的人生对话/俞天白,俞可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ISBN 7-80706-258-4

I. 留... II. ①俞...②俞... III. 俞天白-书信集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5935 号

策 划:刘冬冠
责任编辑:刘冬冠 刘丽娟
装帧设计:张志全
版式设计:李如琬
责任制作:晏恒全

留德家书

一个本土作家和他留德博士儿子的人生对话

著者:俞天白 俞 可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 960 1/16

字数:420 千字

印张:18.75 插页:1

印数:1—10100

ISBN 7 - 80706 - 258 - 4/I · 138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555

引言

父亲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公开这些家信

2005年5月中旬,我儿子俞可获得联邦德国哲学博士学位并决定归国的一个月前。

在我老家一所重点中学的阶梯形教室。

我应邀向文学社的数百名同学谈我的文学创作之路。我谈到了我的父亲如何给我播下文学的种子;谈到了我如何以文学作为一条人生出路,走出了人生困境;也谈到了我因某一部长篇小说引起全国轰动以后,差一点卷入了一场漩涡……报告以后,照例留一点互动的的时间。现场气氛相当热烈。即将结束之际,有位同学突然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俞老师,您认为,您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

“我的儿子!”我脱口而出。

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出现了这场报告会最感人的一幕。

同学们如此热烈的掌声绝非盲目,也非凑趣。因为,这一天我的听众都是青少年,所以我谈的内容,总是刻意地将我的文学追求,文学理念上的变化,我的人生态度等等,都和我的儿子当年的学习和生活联系起来。我说到了我对儿子的期望,说到了我们父子之间,对人生、对事业、对生活 and 理想的种种思考、交流和冲突,说到了我希望我的儿子成为怎样一个人,我最赞赏我儿子的又是什么……从中,让在座的同学领悟我对他们的殷殷期待。

从理念上说,天下所有儿女,都应该是他们父母精心镂刻的艺术品。可惜,这一场报告会,限于时间和所谈的话题,我没有进一步展开我儿子离家赴德国留学以后的情况。从1991年12月到2005年6月,他离开我们的羽翼单飞德国,在漫长的14个春秋,天各一方,但他和我们父母之间,却没有受到乡关阻隔,继续一笔一画地勤奋“书写”这一部“作品”。这阶段的“书写”,其艰难曲折,远远地超越了以往他成长中的任

何阶段。在异国他乡,他面临的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学业上的沉重负担,人际关系上的纷繁复杂……使一个青年成长中的种种烦恼与躁动,成倍成倍地增长,对于孤单的他,在心理上、思想上、智力上所需的承受力,是难以想像的。我们父子之间,对人生,对理想,对生活,对学业等方面的摩擦与冲突,也随之尖锐了,复杂了,有的时候,有些方面,可以说是带有强烈火药味的。他终于没有迷失人生的大目标,负载着德国学术界对他的盛情赞誉,被授予“德国外籍留学生的榜样”的桂冠,学成归来。不仅成了人,也成了材。这其间,我们父子间的通信——作为这一段人生历程中学习、生活、思想、感情成长的纪录,就达2 000多封,140多万字!有的一封信就超过了一万字!这些信开头是编了号的,到2000年改用E-mail,彼此的通信因便捷而更加频繁,所谈的范围就更广泛了,有时一日往来数次,有的每信三言两语,犹如聊天,以致迷失了编号。我们仍然择其要者而保存下来。当时保存它们的动机,无非是为了日后弥补回忆的残缺,从来没有想到会像被誉为“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诲”的《傅雷家书》那样公诸于世。是我的老友冬冠兄诚挚的提议与热诚的鼓动,使我们择其要者出版,以便与社会共享。

于是有了这一本家书选编。

这本书,除了在第一部分对我们父子已经发表过的一些短文做了必要的引录以外,所有信件,都是我对同学们这一阵感人的掌声的另一个、或许是一个可能会引发更热烈更感人的掌声的新注解。读者不仅看到了我这一个作家,如何写出我最好的这一部“作品”,同时,也看到了伦理学上的一个奇观:我们的儿子如何塑造出了他认为最值得尊敬和信任的父母!

这难道不是天下所有父母、所有儿女的心愿吗?

——愿天下父母都说,我们最好的作品,是我们的儿女!

——愿天下儿女都说,最值得我们尊敬和信任的是我们的父母!

这,就是我们一家,不憚浅薄鄙陋,不怕外扬“家丑”和抖搂个人隐私,而公布这些家信的完整意图。

目录

引言 父亲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公开这些家信/1

1 出国之前
的一个习惯与一个观念 1

是自幼养成的运用文字表达的习惯,才有

这种方式的人生对话/1

是平等的观念,使父子站在同一个平台上

面对世界、审视人生/2

父与子: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8

说到底,“父母始终是子女的终生老师”/11

2 两个
“世界的一半” 12

断线风筝:想不到,出国的第一封信是这样

盼到的/12

瓦格纳先生,怎么如此难以亲近?/18

莱茵河畔的苦苦挣扎和黄浦江畔的日夜焦

虑/21

“不论我脸上如何涂鸦,这个节日永远不属于我”/30

“知耻近乎勇”/ 36

我需要的是,寂寥中的沉思和孤独中的成长/ 44

爸爸,妈妈,我并不孤独……/ 55

3

我们彼此

都需要了解、承认和适应这个社会

62

欢乐的圣诞/ 62

中国人,德国人/ 65

一次东德之旅竟让大学录取了我/ 77

游走在日耳曼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之间/ 83

我们彼此都需要了解、承认和适应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 89

4

从“父母的我”

到“社会的我”

104

马克思是我的偶像……/ 104

“阳光列车”:接受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越洋采访/ 108

德国人是可以深交的/ 112

我的社会化进程:从“父母的我”到“社会的我”/ 121

历史,其实是走不出的;人活在现实中,也活在历史中/ 124

“社会的我”的重要标志是,能否承担社会责任而不是索取甚至逃避/ 133

5

迷失:

出国这步走错了?

141

优越感:贫困中的富有/141

自信与自我烦恼:一种自恋行为的二律背反/150

在思想与情趣之间挣扎/156

“不食人间烟火”:我真的成为一个落伍者了吗?/161

德国老童生:留学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166

朋友,永远是存在一定距离的/173

“越看越远”:甘于寂寞的代价/179

“越看越远”:个性化的代价/183

“越看越远”:唯美主义的代价/187

“越看越远”:一“错”真错了吗?/191

“越看越远”:彼此失望/196

6

核桃肉的暴出:

“德国外籍留学生的榜样”

201

一文激起千层浪/201

而立之年的庭训:响鼓还需重槌/209

并非亲情阴影:“一个没有经过这场冲突的孩子,是不会成熟的!”/219

我就是要用鲜明的个性去增加世界的丰富多彩/226

拒绝留美:德意志的人文主义精神的血液,是为了浇灌我的本土之花的/232

一篇论文竟让德国教授对我刮目相看/

237

在不同可能性之间选择:从硕士到博士/

240

硬壳就是这样给敲开的:“德国外籍留学生的榜样”/248

对爱的感念:二姨妈、事业和故土/254

身在国外,中国却是个永恒的主题/261

德国导师的恍然大悟:“我的老天,一个多么有创造性的家庭啊!”/269

不戴博士帽的博士儿子仍是父母的儿子,充满稚气的作家父亲还是儿子的父亲/280

余音

一份来自联邦德国内务部的

电子信件和一个谜

285

联邦德国内务部发给俞可的电子信件/285

谜底在哪儿?谜底就在这儿!/285

结语 儿子的话 我们父子的一段“社会化历程”/286

编后感言 留德家书——不仅是家书 刘冬冠/288

1

出国之前的 一个习惯与一个观念

是自幼养成的运用文字表达的习惯,才有这种方式的人生对话

是一种习惯。

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这一习惯是俞可自幼在家庭的氛围中养成的。其主要途径,就是写日记。这从小学老师教他写作文以前就开始了。1982年,俞可小学五年级,父亲从他所写的日记里,发现了童心里那一份真挚的爱,建议他将有关素材写成一篇短文。文章写成,寄给了《儿童时代》。不久就被这家杂志作为“小苗圃”的征文发表,并获得这次征文奖,而且名列榜首!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难忘的小伙伴》,全文是这样的:

我常常会想到我早已死去的“小伙伴”——一条一只眼睛的金鱼。

本来,我家养着三条可爱的小金鱼——红色、黑色和红白色的。这三条金鱼是外婆的邻居李伯伯送给我的。可是,我没有养鱼的经验,养了三天就死去了两条,只剩下一条黑的。我想:这条金鱼太孤独了,要给它找几个伙伴才好。想向李伯伯再讨几条,可是又不好意思。我就请小舅舅去买了两条小金鱼。

金鱼买回来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进鱼缸里。哈,这条黑色的小金鱼活跃起来了,和另外两条金鱼一起游来游去,显得非常高兴。我也非常高兴。这三条金鱼成了我的“小伙伴”,我天天亲自给它们喂食。

一天早上,我给它们撒进一些鱼虫干。两条金鱼大口大口地抢着吃,可一条比较小的红色金鱼反应很慢,只吃到了一点点。这是什么原因呢?我盯着这条小金鱼仔细看,原来这条金鱼只有一只眼睛是明亮的,另一只左眼却不知怎么瞎了。

这件事被表姐们知道了,她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把它丢掉算了;有的说别去管它,饿死就饿死!总之,她们都不喜欢这条金鱼。我不同意她们的意见,这条金鱼虽小,可也是一个小生命呀!它又瞎了一只眼睛,多可怜!它像残疾人一样苦恼,我们应该同情它,爱护它,怎么能丢掉它,让它饿死呢?

于是,我每次喂它们的时候,总是先用网罩把另外两条金鱼隔离开,让这条一只眼睛的金鱼吃一会儿,再让它们一起吃。

就这样,它和另外两条金鱼一样,能够吃得饱,玩得快乐。它天天和它的同伴一起在水中玩耍,东游西荡,和睦相处。我看了,心里高兴。

暑假到了,我要到姨父家去住一个星期。谁来照料这几条金鱼呢?我想带到姨父家去,又怕金鱼在路上死掉,只好托表姐们照料它们。特别关照大表姐,要照料好那条一只眼睛的金鱼。

大表姐笑着说:“什么好宝贝!你放心吧,不会死的!”

一个星期以后,我从姨父家回来了。一到家,就急忙先到阳台上去看我的金鱼。一看,鱼缸里只剩下两条金鱼,那条一只眼睛的金鱼不见了。我急得哭起来。

大表姐走进来,对我说:“你别哭了,反正是只有一只眼睛的,死掉就算了。”这会儿,我哭得更厉害了,边哭边质问大表姐:“是你没有养好它,我要你赔!”大表姐看我这样伤心,一下子被感动了。她说:“好吧,我就赔你一条!”说着,她转身就走了出去,一会儿,她手里捧着一个小饭碗走了进来。我擦了擦眼泪,睁大了眼睛看着碗里那条鱼。我以为大表姐在跟我开玩笑,把一只眼睛的金鱼藏起来,现在又拿出来了。我仔细一看,这不是那条一只眼睛的金鱼,但我非常熟悉这条金鱼。乌黑的鳞片,瘦瘦的身子,尾巴三长两短的,长得很不齐,看上去非常难看。表姐惭愧地对我说:“这是我向李伯伯讨来的,他不喜欢这条金鱼,早想把它丢掉。我们一起来养这条小金鱼吧!”

过了几个星期,这条金鱼被我和大表姐养得胖胖的,好像尾巴也齐了。它有时候活泼地跳跃出水面,好像在说:“小主人,谢谢你救了我!”

今天,我看到这条金鱼的时候,就会想起和我一起度过一段童年生活的“小伙伴”——一条一只眼睛的金鱼。

文章自然幼稚。然而,这巩固了他写日记的习惯,开始了他与文字的难解之缘。

是平等的观念,使父子站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对世界、审视人生

是一种观念。

长幼有序的家,同在一个屋檐下,每个成员的人格却是平等的。父子也不例外。这主要是将平等观念,贯穿在饮食起居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里,渗透在亲情间的所有关爱言行举止之中。尤其是发生了摩擦,需要教育、开导甚至批评的时候,这一份平等观念,就特别珍贵。开头,我们家庭成员间的平等观念都是封锁在家门之内的,终于有一天,在一个不经意间向社会公开了。这就是发表在《现代家庭》杂志1989年第八期上题为《父亲与儿子》的对话录。它竟成了父子平等的宣言:

我们父子俩，一个是爬格子并欣赏别人爬格子的作家兼编辑，一个是背着学生的书包从家门到校门进进出出了12年的大学生。同桌吃饭十余载，却很少有机会交流思想。有时候意见相左脸红脖子粗，当然也有不少和谐之处。忽有编辑上门约稿，且指定专写我们父与子的。于是有了相互关照对方形象的机会。由此而产生了以下洋洒洒的对话：

俞可：这个主意不错吧？是我出的！终于打破由你任意描绘我形象的局面了，俞天白！

俞天白：你又来了！“俞天白，俞天白”的，我可是你的爸爸！我曾经说过，看来我应该喊你爸爸了！那是我无可奈何说的气话，你当真啦？

俞可：你说到哪儿去啦？我可没有那么蠢。直呼其名只是表示我们父子平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我对你的赞赏，表示我的爸爸不同于别人的爸爸。

俞天白：又是诡辩吧？

俞可：我是个诡辩的人吗？说真的，都说你在外婆的门下这个大家族中，是思想最开明的一个。凡是两代人对峙，你总是站在我们年轻人一边的。在你们编辑部，不少青年编辑经常当着我的面喊你“小伙子”，把你归于他们的一群。所以，在我的眼里，你应该是我的同代人……

俞天白：就是这种心理因素吗？

俞可：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外国影片中，儿女经常喊父母的名字。像《英俊少年》和《克莱默夫妇》。我觉得这样称呼很随和，坦诚，比喊爸爸妈妈亲切得多。

俞天白：文化引进，够时髦的了……

俞可：当然。谁都不希望沿袭千古不变的规矩生活。不满现状、改变现状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向前发展和进步的目的。

俞天白：可以理解。我们正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点上。你随口而出的一声“俞天白”，曾经引起我很多思索。我分析过你的动机，所以我默许了。可你妈妈责备我为什么不管教管教你，你妈妈也曾经恼怒地开导你：你怎么这样喊爸爸？一些邻居则好奇：怎么对爸爸喊名字？我倒没有感到父亲的尊严因此有什么损害，只是屈从于世俗，关起门来向你提了一个折衷的要求：最好不要这么叫，至少不要在有外人在场的时候这么叫。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这种心情。因为，我们父子俩碰的钉子够多的了！

俞可：你是指那次“烟花事件”吗？

俞天白：是的，让我谈谈那次事件之前父母对你的心情。有一天你交给我一份让我脸面发烫的成绩单，同时还有一个要求，参加文学兴趣小组。当时我没有说什么，当夜深人静，你在三用沙发上入睡时，我凝视着你那张稚嫩的、胖乎乎的脸，想了很多。你太幸福了。你太娇惯了。这么大的孩子，还不时扑进妈妈怀里撒娇。而在同学当中，却像一只羔羊。因为你胖得出众，同学们总是拿你当玩具惹你，看你出洋相。你太胖了，胖已经成为了你的灾祸之源。扑到妈妈怀里，几声嗲声嗲气的“妈妈”，其

实是在饱受委屈以后寻求感情补偿,这是一种向负极发展的信号!我恍惚看到了你整个生命经历:身无所长,逆来顺受。怎么办呢?按照你日记中显现的文学才能,可以让你从少年起就在文学上发展。但我又怕拔苗助长,最后导致此路不通,苦痛一世!不。对你来说,当务之急,是培养你坚强的个性。“烟花事件”就是第一个闯到我眼前来的事例。没有料到,我们父子俩碰了一个大钉子,你差一点被赶出了校门——你当时曾经埋怨过我吧?

俞可:没有。我埋怨的是那位语文老师。在课堂上,他竟拿街头小摊的广告上所写的文字来证明他没有错。他不仅挖苦我,还挖苦你。虽然没有点我的姓名,可全班同学的目光都投到我的身上来了,只有我的父亲是作家啊!我当时呆在座位上,一回家,我已经无法依靠,只有扑进妈妈怀里喊一声妈妈来弥补心里的创痛了!我哭了,伤心地大哭了!

俞天白:全家黯然!你妈妈怪我出了个馊点子,太不安分。你的班主任和班级里的干部都好心地向你劝导,向老师认错。都给你毅然拒绝了。面对期终成绩报告单上语文栏那块刺目的空白,我除了去找校长申诉以外,别无他法。我无法劝你放弃你所持的态度。多亏陈校长理解我,支持我们父子,才使你有了一个参考过去语文成绩来打分的圆满结果。

俞可:这场纠纷,使我真正地变了。

俞天白:你变得坚强了,有主意了。

俞可:不完全这样。我忽然理解了,而且通过对你的理解,开始理解我们的社会,理解我将面临的人生了。稚嫩,被我丢在了少年时代。

俞天白:是这样吗?

俞可:是的。我从那以后,忽然发现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概括你:你对人生世态的观察理解不乏深邃,但真正要周旋于社会人生的海洋中时,却又这样迂腐无能!

俞天白:你说得具体一些?

俞可:你在社会上和人打交道时(即所谓“公关”)你是一个书呆子;可是看你的小说,看你对人情世故的描写,你又绝对不是一个书呆子。你对人情世故懂得真不少。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现象?我曾经在日记里作过分析。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你并不算很成功,但很幸运,因为时代没有抛弃你,你也以你的勤奋,没有辜负时代对你的选择。我说的“不算成功”,是相对于影响而言的。与某些青年作家相比,你的小说不太讨巧,也不新潮。你只注重现实,注重于传统。你永远传统的儿子,现实主义的苦行僧!此外,作为一个著作颇丰的中年作家,你缺乏一个相应的行政地位,而在目前中国“官本位”的情况下,学术地位往往是由行政地位来决定的,而学术地位,还以获奖次数的多少、获奖级别的高低来决定。而这两种地位的确立,又在一定程度上靠活动,靠“感情投资”。如果你能改变自己,将自己对人情世态的观察、分析作为你“公关”的理论指导,那么,你在名利地位方面,一定会超过现在所拥有的。

你说我分析得对不对？

俞天白：……

俞可：能否得到你的承认，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面镜子。文坛，在我眼里，已经绝对不像一般人心目中那样神圣！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俞天白：哦！如果我能够成为你生活镜子的话，我的迂腐也就具有特殊价值了。至于文学道路，好多年以前，我就不希望你作为惟一的道路来走，至少，不希望你过早地染上“文学病”。

俞可：我知道。我曾经编织过当作家的梦。是你撕破了它。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你就为我的日记击节赞赏。可是你并不希望我从此与文学结缘。你认为过早地陷于文学是冒险行为。中小學生一旦迷上了文学，就很容易被文学牵着鼻子走。因为文学，说到底是感情的东西。沉入其中不是沾沾自喜，目空一切，便是悲悲切切，抱憾少知音。其结果都会妨碍自然科学知识的掌握，将知识面搞得很窄，影响了对整个世界的认识。这就是所谓“文学病”。如果先做了自然科学工作者，再去当作家，根底扎实了，作品才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我当时接受了你这些观点。但是从我对你认识加深了以后，我又懂得了一点：当不当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实现民族精神的重新建构。而我们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文化批判！

俞天白：嗯，很有点叛逆精神。这倒像你的本性——你的本性，是你呱呱坠地的时候外婆首先发现的。你的头发很黑，很稠密，而且头顶有两个旋，啼哭声也特别洪亮。你外婆马上说：这小团脾气倔！

俞可：（笑）我不相信这一套。如果有股倔劲的话，是你从我少年肥胖症的灾难中，把我挽救过来的。你将你这种努力，渗透在各种日常生活里。你看看我们房间的装饰。最醒目的地方，悬挂着一幅画：两只啃吃春草的羔羊，还有一把饰有鲜红流苏的龙泉宝剑。你在悬挂这把剑时对我说的话，不知记不记得？

俞天白：大致意思记得，原话记不清了。

俞可：我可记得很牢。你说，做人，应该像羔羊这样诚实、善良，但必须学会运用剑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人，应该是羔羊和剑的统一体！我知道，我的性格相当懦弱，你记得吗，在小学里，坐在我身后的女同学，居然用削尖的铅笔戳我的背脊，铅芯刺进我的皮肉，至今还留有一个痣斑一样的黑点。我当时只会哭。上课时，说话的明明是我身后的几个同学，课后老师追问谁不遵守课堂纪律时，他们全推到我的头上。我也只会哭。比我调皮的同学都参加少先队了，惟独我不合格！我不懂得怎样向同学和干部表示友好，只知道下课以后默默地在教室和走廊里捡废纸团，表示自己是关心集体的，却被那些少先队员传为笑料。多亏你及时给了我这一把利剑。

俞天白：看来，第一个被你解剖的，是我……

俞可：你害怕了？

俞天白：不不不，如果你真的比我强，我会含笑赴九泉的。这是所有父母的心境。

我渴求事业上的诤友。如果你能成为我这样一位诤友,你就成为了我这一生最好的作品!在你眼里,我始终是个乡下人,是一个农民。你曾经引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形容我:“农之子恒为农。”你看了我写农村生活的小说,说我始终将那闭塞的山乡装在自己感情深处。尤其是看了我的中篇小说《活寡》之后,你说:“你从江南山区坎坷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出来,却又通过你的笔,将我们轻轻松松地带回到你的山乡去,一起品尝那些山民特有的甘苦。”在这开放的年代,农民、小农经济、小生产者等等,总是首先要遭到批判的。我真希望更多地了解到你眼里的我,是怎么一副模样。

俞可:其实,你在创作上是不断地分析解剖你自己,然后调整你的文学视角的。你的新作《大上海沉没》就是你创作上的又一个转折点。你已远离你的农民形象了。我看了你这部长篇以后的最深的印象,是你对“阿拉上海文化”的辛辣的、然而又充满了爱心的批判。

俞天白:是的,文学的价值在于批判的力量。听了你这一番见解,我倒真的为你没有走文学道路后悔了。

俞可:可我不后悔。文学仅仅是人生生存选择的一种方式。或许在某一天,我会运用文学来实现某种文化批判的目的。但我现在学的是教育。我在这一年中,想得最多的是在我们的教育中,如何贯彻这种文化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如何在文化批判的基础上建构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然后重新建构民族精神。

俞天白:哦,难怪你每个星期天都跑书店,并且常常会蹦出一串串新名词新术语,引起了亲友的惊讶。

俞可:你讨厌新名词?

俞天白:不不不,我讨厌的是随意杜撰和密集型的新名词轰炸。中国需要文化更新。新名词的产生是文化更新的一种需要。

俞可:我为你的开明感到高兴。

俞天白:不要高兴得太早。可能我们父子还会遭受到碰壁之苦。我碰破了脑袋无所谓,怕只怕你……

俞可:我也无所谓。因为你已经交给了我一把利剑,还有一个方法:生存选择的多元取向。这条路不通走那条。放心吧,爸爸!

可惜,这种平等观念,在我们社会上未必行得通。教训却是实实在在的。想不到,给俞可最惨重的“教训”的竟是他的老师。惨重得真用得上“头破血流”这个词。这就是《父亲与儿子》对话中提到的“烟花事件”,俞天白在《人不是猫,也不会是虎》(《文友》1994年第十期)一文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自信和独立思考历来是亲姐妹,这是我知道的,所以施行这方面教育的时候,很难区分是为了培养他获得自信,还是培养他独立思考,反正这两种素质对于我

的儿子同样都是重要的。可惜,我没有估计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自信和独立思考往往被一些人视作骄傲自大。而这些,又使他成为愈益孤立的因素。事情严重到了这种地步:在他上高中一年级的時候,语文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观虎年烟花》。他发现,老师把“焰火”或“礼花”错成“烟花”了。“烟花”有多种解释,“烟花三月下扬州”,是指春景;“堕入烟花”,指的是倚门卖笑的妓女。就是没有“焰火”或“礼花”的意思。他没有当场完成作文,回家来翻阅《辞海》等工具书时,被我发现了。我毫不犹豫地說,老师写错了,你应该将这个词改过来。你可以在作文前面写几句解释的话,提醒老师,并请老师谅解。他說老师会不高兴的。我说,怎么可能呢?老师们不是教育你们“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吗?你这样做了,老师一定会表扬你的。要知道,你读的可是重点中学,老师都是很优秀的。他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潜在的那份自信被我鼓动起来了。他不仅改了作文题目,而且在作文前面写了一段“序”,指出老师题目中的错误。他做得很谨慎,是悄悄地交给老师的。

应该说,这是我的成功,也是老师的成功。

然而,一心期盼老师表扬的他,却期盼到了一场大祸。这位老师一到课堂上,就用了半堂课的时间大光其火,讽刺,挖苦,斥责,嘲笑……其用词之不当,只有失了态的人才会如此。而且这仅仅是开始,从此以后,这位师长居然拒绝给俞可批改任何作业,包括考试的试卷。学期终了,俞可的语文成绩是空白的。多亏校长出面干预,才不至于留级。这不仅是涉及一场升、留的风波,而是影响一个青年素质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关键。幸亏在这个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我始终站在俞可一边。绝不是袒护,而是我树立他的信心的继续,使他懂得应该怎样去坚持真理……

真的,我们丝毫没有因为这一事件而改变处世态度。俞可大学一年级写的评论文章就是一个证明。他居然对父亲数百万字的作品评头品足、指手画脚了。洋洋洒洒地,以万字长文概括了自己老子文学道路上的三次“迷失”,并对潜在的“超越”契机,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不说别的,光看这个题目,就令人想起“不畏前贤畏后生”的那种居高临下:《论俞天白的自我迷失和自我超越》!上海大型文学杂志《小说界》居然不惜篇幅,在1990年第二期上予以全文发表。只看此文最后一段,就可见“严厉而又殷切”的风貌了:

……文学是一座古老的大森林,谁都可以进去闯闯。俞天白在偶然之中走进了这座大森林,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饮水和现实主义的干粮,漫步其中。然而,文学没有指南针,谁都可能在其中迷途而不知返,精神的挣扎在此时成了最痛苦的事实。但是,没有哥伦布的那次迷航,就不会有美洲大陆的发现。这迷失不是厄运的丧钟,而是历史的契机。俞天白从一次次自我迷失中寻求到自我超越的坦途,这是幸运的。引火烧身是恐慌的,但谁又能像凤凰那样在烈火中涅槃呢?俞天白或许能使我们的这种焦虑消失。

父与子：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

儿女到底是儿女。

儿女有儿女的人生，儿女有儿女的世界。大学三年级，俞可毅然退了学，怀着一腔憧憬，远走德国留学去了。父母与子女，迟早是要分离的，不管是生存舞台的转换还是自然规律的支配，都是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阔别。但是，这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长距离长时间的别离，其内心的惆怅与失落，远远超过了一般空间上的分隔。俞天白给《现代家庭》1996年第八期所写的那篇《窗外的窥视》，就写出了这种心情：

对于生儿还是养女，我一向是无所谓的。当然，最好是儿女双全，如果要我选择一个，那我要的是女儿，而不是小子。

我刚结婚那年月，并没有只能生一个的限制，但我们夫妻都以得一为足。多生，经济能力和精力都不够。所以当我妻子怀孕的时候，我暗自希望能获得一位千金。然而，当仁济医院妇产科护士告诉我，我得了一个儿子的时候，我还是高兴得如获至宝，急急忙忙地奔到岳母家报告：“生了，生了，是儿子！八千克！巨大儿！……”那欣喜之状，无人不以为我如此失态，就是因为所得的是儿子。这成了我此生永远无法矫正的误解之一。

初为人父，心情的确难以描述。最迫切的，是想看一看我所创造的这个生命到底是怎样一副形状。那时小生命出世，要在婴儿室置24小时后，方能进食。得知可让母亲喂奶的时间是在清晨，还在家属不准进病房的时候。见子心切，进房又无路，情急间，我居然想到了仁济医院的妇产病房后面，有一架露天楼梯。于是我在医院里绕了好大一个圈子，逃过了好多医护人员的阻拦，绕到了那条露天楼梯上。我妻子的床位靠窗。但要看清被拥在怀中的儿子的脸蛋，必须再上一层楼俯视。好不容易选择了一个角度，让视线透过玻璃窗的那一瞬间，成为了永远定格在我心里的图景之一。那是红得发紫的一块肉团，头发又浓又黑地罩在头顶，眼睛紧闭着，嘴巴张开着，左寻右觅地寻找奶头。正是黄梅季节，天很闷热。脸上油光光的，累得都出汗了，直到母亲把奶头塞到他的嘴里，才使劲地吮吸起来。双颊一歛一歛的，见到儿子这种旺盛的本能，我不禁笑了。

这是我父子间的第一次隔窗窥视。

第二次隔窗窥视，是在四年以后。这以前，白天由他外婆照料，晚上我们夫妻带回家。鉴于隔代抚养的种种弊端，我们决定让他进托儿所，然后进幼儿园。他不愿，我们也是出于无奈。但这一步不能不走。那是里弄托儿所，设在石库门的底楼，离我岳母家只有几步之遥。第一天，我把他送进门，将自己应该携带的小板凳交到他的手中，回头就走。他哭着，端着小板凳追我。刚到天井，就给阿姨抓了回去。我实在于